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

Fiscal State of Imperial China and Its
Transformation

○ 刘守刚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

Jiacai Diguo jiqi Xiandai Zhuanxing

○ 刘守刚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 / 刘守刚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04-041470-7

I. ①家… II. ①刘… III. ①财政史—研究—中国
IV. ①F81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2001号

策划编辑 杨莉
责任校对 刁丽丽

责任编辑 杨莉
责任印制 刘思涵

封面设计 张志

版式设计 王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60千字
插页 2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n>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1470-00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 2006 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序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国家产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兴办各种公共工程、公共事业，以及开支国家公职人员的薪俸，征收各种赋税便成为国家的一大要务。财力大小是否与国家治理的需要相匹配，税负轻重能否为社会所承受，财税征收、管理和使用的方法及程序是否便捷、公平和合理，财税体制是否和经济发展、社会构成状况及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更是赋税征收和使用中需要不断关注和调整的基本问题。而各种利益集团则常常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或变革既有财政制度和财政运行，阻止或发动相关的改革，力图确保他们的现有特殊利益或获得新的特殊利益。因之，财政制度与财政实际运作直接关系资源如何配置，财富如何分配，社会能否稳定与和谐，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中国自周、秦以来，财政制度和财政实际运作有过多次重大改革、重大变迁。尤其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财政制度及其实际运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中坚构成部分。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国家的统一并成长为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国内各族群、各地方，成长为一个巨型的现代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而弥新，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同两三千年来财政制度的创立、革新及财政有效的实际运作密切相关。而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诸多弊端、诸多危机、诸多挫折，也经常同这些财政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的缺失密切相关。

刘守刚的这部专著《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是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作为访问学者时的成果。他试图从财政视角来考察中华国家成长及现代转型的基本过程。他以自己设

定的“家财型财政”这一概念为切入点，按照时间线索，融合思想发展与实践历程，从财政活动的三个环节（收入、支出与管理）入手，勾勒出中国几千年来财政的形成、发展、成熟及向现代转型的主要轮廓。

探索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研究中华文明的转型，刘守刚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结构。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是一种为等级差序所主宰的社会共同体，基本上是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乡里，由乡里到郡县，由郡县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累进构成总的等级差序格局。这一家国同构且密切相连的结构，在中国历代文化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演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在传统家国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复合型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这是一种既非单纯国有，又非单纯私有，而是力图将国家权力对土地的管理权和直接生产者对土地的支配权结合在一起的制度。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将民众个人、家庭和国家紧密地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家国共同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三位一体，是中华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以及中华民族在艰难困厄中一再复兴的奥秘所在。刘守刚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中华传统国家中这一家国共同体基础，并以此为前提设定“家国式家财型财政”概念，来分析中国历代财政的产权方式、收入形式、支出责任和管理制度在历史长河的演变及其在近现代发生的转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帝国财政的双轨互动、帝国发展的财政基因等见解，并由此探寻中国近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道路与财政动因。这虽然仅仅是一个尝试，但显然是有价值的。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选择一些新的视角，以更真实、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历史的积淀、中国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资源及问题。

我希望的是，这一著作的出版，能成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放眼世界，回望中华；走向世界，回归中华”努力的一部分，以共同促进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归根到底，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只能走自己的路。

期待着作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继续坚持下去，取得更多成果。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从财政视角“回望中华”	1
1.2 国家、国家类型与国家转型	3
1.3 财政、财政类型与财政转型	10
1.4 财政与国家成长	17
1.5 本书写作的基本立场	22
1.6 本书的框架安排	25
第 2 章 家财帝国的兴起及其曲折	27
2.1 帝国初兴与家财型财政制度原点的确定	27
2.2 第一帝国家财型财政的形成	45
2.3 第一帝国的崩溃及其财政教训	68
第 3 章 家财帝国的调适与制度界限	81
3.1 混乱时期的财政探索	82
3.2 以“税地”为核心的帝国财政初步成型	94
3.3 为应对外来危机而向工商业寻求财政收入的弹性	107

第4章 家财帝国的成熟与转型内因·····	133
4.1 高度成熟却低弹性的财政收入体系·····	134
4.2 消极主义职能观支配下的财政支出体系·····	154
4.3 不断集权却难以理性化的财政管理体系·····	169
第5章 从家财帝国到税收国家·····	197
5.1 晚清财政转型与工具性国家变革·····	198
5.2 目的性国家的变化与财政转型在民国时期的失败·····	223
5.3 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衰与税收型财政的再建·····	239
第6章 中国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	259
6.1 帝国成长的财政基因·····	259
6.2 通向现代国家的财政道路·····	271
附录 财政政治学探索·····	287
参考文献·····	299
索引·····	307
后记·····	309

第1章 导论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多数时间却把目光聚焦在西方世界，试图模仿或超越西方所显示出的景象。时至今日，当这种景象在中国已大多成为现实时，也许该把目光收回来，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体会一下其中的艰苦卓绝了吧？

本书并不打算对中国从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进行全面的研究，这将是一项过于浩大的工程。笔者想做的是，从财政的视角研究中华帝国的成长及其现代转型的基本过程与内在逻辑，为“回望中华”^①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1 从财政视角“回望中华”

近代以来，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对中华传统的评价，有两种声音始终比较响亮：一种是肯定，即对中华传统持肯定的态度，肯定者的立场，从一开始的全盘维护传统、摈斥西方，慢慢退缩为呼吁对传统抱有“同情”的态度；另一种是否定，即否定中华传统，否定者的要求从一开始的“取西方之长补中华之短”，逐渐发展为呼吁“全盘西化”或者以西方为超越对象。其他的声音自然也有，但始终不像这两种声音那么高调。在这两种

^① 复旦大学姜义华先生于2011年春在课堂上提出“回望中华，回归中华”的号召。本书的写作深受姜先生的鼓励和指点，也希望能为这一号召的实现，增添一点小小的力量。



声音中，又以后者更为响亮。

与其他领域相比，对传统中华政制持肯定态度的人就更少。占据上风的声，始终是运用今天的政治标准（民主、人权等）来批评甚至否定传统。这种批评和否定的声音，同样体现在对中国传统财政制度的研究中。在中国财政史研究中，对帝国财政制度持肯定或者至少持相对同情态度的著作并不多见，而批评甚至否定帝国财政制度的看法明显占据上风。特别地，越是涉及帝国晚期财政的研究，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就越是主流。

帝国政制是中华先民在特定时代的伟大创造，它曾为中国国家成长、中华文明拓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也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迄今为止，帝国作为国家类型在中国已大体终结，但帝国政制仍对民族心理结构和当代政治运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回顾帝国政制的逻辑特征，考察它的兴衰存亡，以及它对中华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财政制度也是中华帝国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研究的目的是，考察中华帝国政制中的财政制度是如何产生、发展与转型的，或者说从财政视角透视帝国这一国家类型如何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得以成长，其内容主要集中于考察帝国财政中产权制度、收入来源、支出责任与管理方式诸方面的建构方式，以及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从而以一种相对专门但可能更深入的视角“回望中华”。

本书并非一本财政史著作，而是基于前辈在财政史研究中发掘的材料^①，以一种新的框架，来揭示财政制度变迁中的政治意义，探索财政在帝国成长与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展示其中艰难曲折的思想与实践过程。通过这样的研究，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有：（1）维持中华帝国长期发展的财政机制是什么？（2）主导帝国财政成长及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基因）是什么？（3）从财政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有什么独特性？（4）中国政治发展的财政动因是什么？

^① 长久以来，有关中国财政史的著作实在是汗牛充栋。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是财政研究中最重要资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曾出版《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古代一些专门研究治国术的专著，如杜佑的《通典》、邱浚的《大学衍义补》等，虽不完全是财政著作，但财政的内容是它们的主体部分。近现代以来，以《中国财政史》为名的著作和教科书也是层出不穷。对此，叶振鹏主编的《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做出了专门的概括。断代或专题性质的财政史或经济史研究著作，如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葛金芳的《宋代经济史演讲录》等，也为财政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海外学者专题性质的财政研究著作，如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王业键的《清代田赋刍论》等，为财政史的深化和视角转换做出了贡献。另外，重新出版的万国鼎先生的《中国田制史》（1934年初版）仍是财政史领域中值得参考的重要文献。以上提及的文献及其他更多财政史文献，可参见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

本书要强调的是，对帝国政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要跳出前述中西简单对比的立场。更准确的说法是，不能拿帝国与现代国家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苛刻的对比，而应采用后面将述及的国家类型的视角，在相同的国家类型框架中进行考察与评价。对财政制度的评价，亦应如此。

下面将对本书的一些概念、理论、基本立场和框架安排做一些简单的交代，以便展开全书的叙述。

1.2 国家、国家类型与国家转型

本书从财政的视角研究中华帝国的成长及其现代转型，首先涉及的概念就是国家、国家类型和国家转型。

（一）国家

“国家”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学术文献中，有多种含义。归纳这些含义，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1）用来指称特定时期某个地理空间中的稳定人群共同体，即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更准确地说，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在特定时空中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政治人）所形成的共同体。在共同体意义上，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长期稳定共同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比如，生活在今天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的人群，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数千年来生活在同一空间的主体人群与自己属于一个国家，这里国家的概念显然就是指长时段内的稳定共同体。本书所称的中国，基本上是针对这一含义而言的。

（2）用来指称一套政权体系，即组织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学运用的“国家机器”一词显然更为合适。事实上，学术界已习惯于将国家理解为组织，以强调它是一个能动的、相对独立的主体。比如，在使用“国家构建”或者“国家的自主性”等术语时，用的就是这一含义^①。

上述两种说法，事实上各自抓住了国家的一个侧面，前者强调人群共同体，后者强调政权组织，而现实中的国家，肯定是这两个侧面的综合。为了接下来研究的方便，本

^① 在指政权组织体系时，经常使用的名词是“政府”（广义的）。事实上，没有政府有效行使权力，或者说垄断性地制定政策和法律，并对领土范围内的人群加以实施，也就不存在国家，所以在指称“政权组织”时，学术界并未严格区分“国家”和“政府”，比如在使用国家自主、国家干预、国家构建等术语时，国家更多可被理解为政权组织。



书将前者称为“目的性国家”，这是因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拥有价值与利益等实质性目的；而将后者称为“工具性国家”，意在强调其作为组织或机构，没有具体的价值与利益目的，只是履行工具性的功能。

当然，目的性国家与工具性国家是两个思辨性的概念，特定时空中的现实国家，总是目的性国家与工具性国家的结合体。在一定意义上，目的性国家的人格化代表（政治角色）就是被统治者，工具性国家的人格化代表就是统治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共同构成国家共同体。不过，现实中的统治者显然具有两重身份，作为统治权力的行使者是工具性国家的成员，作为自然个人则是目的性国家的成员。比如说，国家领导人在行使职权时是工具性国家的成员，但在缴税作为纳税人出现时是目的性国家的成员。

现实中的国家，其动态表现是权力的运用。如果从动态即权力运用的角度来理解国家，那么工具性国家和目的性国家就可用迈克尔·曼的术语体系表达如下：工具性国家，大致相当于他所说的社会权力中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目的性国家大致相当于他所说的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①。如果从权力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两个维度来衡量工具性国家与目的性国家的特性，可以理解如下：工具性国家最为重要的特性是有效性（或者称为“理性”），即作为高效率的工具发挥作用，这种有效性既来自统治者有意识的努力，也来自被统治者的要求；目的性国家最为重要的特性则是合法性，即人群共同体的自我认同以及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同，显然这样的认同既源自目的性国家（被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又来自工具性国家（统治者）有意识的塑造。

现实中的国家，其静态表现就是国家制度。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国家，那么国家就是一系列权力运作的规则与程序，这些规则与程序，是现实国家的表达形式。显然，这一形式是目的性国家与工具性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②。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③ 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相当于本书所说的工具性国家。马克思所说

① 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章。

② 可以设想一个简单的国家诞生寓言来加以说明。一个武装团伙（工具性国家的人格化），占领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目的性国家的人格化），两者展开了互动：武装团伙要求村庄共同体提供粮食物资（财政资源的要求）和人力服务（人力资源要求），并对其群体结构和价值观念进行一定的塑造；村庄共同体在为武装团伙提供上述资源的同时，也对这一武装团伙提出要求（保护村庄安全、维持内部秩序、按村庄共同体的价值观主持正义等）。如果上述互动过程比较顺利，双方结合就会逐渐紧密起来而成为一个国家，并建构起一系列权力运行的规则与程序（即国家制度）。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16。

的“非政治国家”，相当于本书所说的目的性国家^①。马克思所说的“契约”，就是静态的国家（国家制度）或者国家的表达形式。而马克思所说的“协调”，本书将其称为“工具性国家与目的性国家的互动”，其内容具体说就是，工具性国家运用权力去管理、塑造和提升目的性国家，而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功能发挥与组织设置在利益和价值两方面提出要求，极端情况下干脆加以再造（即革命）。

（二）国家类型

林尚立先生曾根据国家的三要素（人口、土地和主权），将自古及今的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②。这三种国家类型，分别以上述三要素中的一种作为自己的支撑点：城邦以人口为支撑点，帝国以土地为支撑点，现代国家以主权为支撑点。在不同支撑点基础上形成的三种国家类型，其内容可用表 1.1 概括。

表 1.1 国家的三种类型

国家类型	支撑要素	表现形式	目的性国家层面	工具性国家层面	典型的现实国家
城邦	人口	规模较小的人群团体，多为拥有城墙的城市（也包括周边可控制的乡村）	维持自给自足的游牧或农耕生活，重视公共生活中人的德性	具有简单的政府组织机构，公共权力往往与军事权、宗教权或族权结合在一起	古希腊城邦、苏美尔城邦、商代及春秋时代的诸侯国
帝国	土地	经过征战而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共同体，具有延展性的版图结构	满足人对土地的欲求及生活方式，过农耕或游牧生活，重视家庭与家族的伦理	以君主为中心，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体系，公共权力与君权结合在一起	秦汉至清的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
现代国家	主权	在相对固定土地基础上，由组织化的主权统摄领土与人口，具有民族认同	在私人产权与自愿交换基础上追求工商业经济发展，重视实现个人权利的追求	一般具有由民众自愿选择形成的公共权力组织形式，即代议制政府，公共权力表现为组织化的主权	现代英国、现代法国、美国

资料来源：根据林尚立先生的课堂讲授内容加以扩充与发展而成。

^① 这里的非政治国家或目的性国家，与通常所用的概念“社会”，所指对象基本相同，都指具有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名词，是想表达一点不同的意思，用卢梭的术语来说就是目的性国家依公意而形成，而“社会”依众意而形成。本书在强调中华共同体是具有“公意”的稳定共同体时，倾向于使用“目的性国家”一词，而在意指具有多种利益与价值（众意）的群体时倾向于使用“社会”一词。

^② 国家的三种类型及各自的支撑要素内容，来自林尚立先生的课堂讲授。另外，英国学者帕克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增加了由上述三种类型综合而成的第四种类型（参见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1）。



当然，上述国家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型的说法。现实中的国家，并非如此纯粹，而可能是上述三种类型的混合物。比如，同样被现代学者称为封建国家，周代的诸侯国是城邦与帝国的混合物（周代早期更接近于城邦，后期更偏于帝国），西欧的封建国家却更多地像帝国（到绝对君主制时代，已更多地具有现代国家的性质）。还有，如 19 世纪末的英国，则是现代国家与帝国的混合物，即在现代国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本书所研究的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代表。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上，中华帝国经历着初生、成长与成熟，焕发出勃勃生机。帝国政制帮助了这一空间中生存的人群，使其克服种种生存危机，不断发展自己的文明。当然，中华帝国是一个总的名称，在历史上它也曾经历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王朝面貌出现。本书按照其内部发展轨迹，把中华帝国比较典型的阶段（统治期较长、较稳固的王朝），依照政制上的重大差异，划分为第一帝国（两汉）、第二帝国（唐宋）和第三帝国（明清）^①。按本书所使用的术语表达就是，作为目的性国家，中华帝国变化不显著；但作为工具性国家，在君权原则不变前提下，政权组织形式却有三次重大的变化。这三次变化，分别表现在君相关系（上层权力结构的安排）、指导思想（用以解释现有政制的思想）、人才选拔机制（官员的更替方式或者说皇权政府再生产机制）、资源汲取机制（获取财政资源来维持政府的方式）等四个方面。或者说，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四个方面的差异，足以将三个帝国相互区分。如果用有机体的眼光考察中华帝国，那么从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分别是中华帝国初创、成长和成型三个时期。具体可参见表 1.2。

表 1.2 中华帝国的三个帝国阶段

阶段 内容	第一帝国 (帝国初创期)	第二帝国 (帝国成长期)	第三帝国 (帝国成型期)
君相关系	皇权、相权相对分开，宰相为政府领袖，皇权不断设法控制相权	相权一分为三（尚书、中书、门下），群相代替独相，政府制度较健全	宰相职位被废，皇帝兼政府首脑，内阁（清中后期为军机处）辅助皇权运行
指导思想	引儒家学说柔化法家制度，司法上引经决狱，儒学中的今古文经学黄金期	在立法层次上高度融合礼法，理学经由韩愈到朱熹的努力而发展	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标准意识形态

^① 黄仁宇先生曾将中国的帝国时代分为三个时期或三个帝国，即第一帝国包括秦汉，第二帝国包括隋唐宋，第三帝国包括明清（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 [M]·北京：三联书店，2001：152）。但是，黄仁宇先生并未指出分期的标准。本书此处的划分参考了他的说法，但略有变化。

续表

阶段 内容	第一帝国 (帝国初创期)	第二帝国 (帝国成长期)	第三帝国 (帝国成型期)
人才选拔机制	中央太学培养,地方郡国察举后由中央考试选拔,官员私人征辟盛行	开创科举举士制度并不断调整,诸科最终合一,内容最后限于经义	科举制度日趋严密,考试内容固定在四书五经,文体格式也定型为八股
资源汲取机制	舍地而税人,财政上以人头税为主要财政收入,力役繁重	向履亩而税过渡,工商业收入逐渐重要,力役处于制度化消灭过程中	确立以履亩而税的田赋为正宗财政收入,力役在制度上逐渐消失

(三) 工具性国家和目的性国家视角下的国家类型与国家转型

如表 1.1 所示,在目的性国家与工具性国家的层面上,三种国家类型有不同的表现内容。

三种国家类型在目的性国家层面显然具有三种不同的目的。城邦的目的是,在物质层次上维持小群体自给自足的游牧或农耕生活,在精神层次上主要是重视维持小团体生存所必需的德性。帝国的目的是,在物质层次上维持扩大了群体对土地的欲求以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在精神层次上主要是重视家庭与家族的伦理。现代国家的目的是,在物质层次上以个人产权与自愿交换为基础追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在精神层次上主要是实现个人对权利的追求。

三种不同国家类型在工具性国家层面的表现也不同。在城邦中,工具性国家形式不一,总体而言比较简单,表现为以族权、军权或神权等为载体建立起行使公共权力的各种简单组织形式,公共权力与共同体中领袖(宗族、军队或宗教首领)的人格结合在一起。在帝国时期,工具性国家表现为依托于君权而形成的官僚组织形式,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君主对土地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在现代国家中,工具性国家表现为经由宪法建立起来的代议制组织与现代官僚组织,公共权力表现为组织的权力(即主权)而非个人的权力。

可见,公共权力是工具性国家进行构建时所紧密围绕的核心,因目的性国家的不同,构建工具性国家时公共权力的承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①。城邦以人口为支撑点,公共权力主要由人格来承载,表现为权威(结合了统治权与个人魅力),即一个群体中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因其血缘、年龄、知识或能力超越他人)行使着公共权力。帝国以土地

^① 此处对公共权力三个承载体的说法,参考了加尔布雷斯对权力的三个来源的划分。具体参见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分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5。